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 编

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郭树清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与挑战

德怀特·珀金斯

改革者的教训

约翰·麦克米兰

所有者掠夺

乔治·阿克洛夫 保罗·罗默

世界各国的土地制度和财产税比较

理查德·伯德 伊尼德·斯莱克

论破产程序之改进

O·哈特 P·阿吉翁 J·穆尔

小农场、外部效应和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

Z·汉森 G·利伯卡普

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

黄海洲

大学学科布局思考

钱颖一

经济学教育中的问题

王则柯

Comparative Studies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15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They take Japan, NIES, China and ASEAN.

GDPs roughly equal to that of the U.S. Thus these economies potentially constitute a large economic zone, but they are lagging behind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terms of form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rrangements for market integration. As many papers to be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second session, show, the econom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tightly connected in terms of trade flow and FDI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s one of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As a result, as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emerging, these countries will be involved with each other more closely in terms of

allowed to exchange their views on future of the letters of our institution. Having read the papers prepar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I am pleased to produce this book as a subject matter, which undoubtedly becomes another evidence of ongoing policy study.

RIETI who began from the time of its founding by leading Japanese researchers, as well as policy in Japan.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sian economy and explore a viable strategy to deal with an important economic issue,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MERPEP is a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American and Japanese scholars who held an experimental round table conference, who held to the foundation of RIETI. Today's round table conference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to be held for many

EPR Round Table
The conference this year
"Asian". Representing the
present, I would like to
and receive practitioners
we accepted our
and traveled from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15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

ISBN 7-5086-0329-X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11556号

比较·第十五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329-X/F · 811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卷首语

狄更斯一定不会预料到，在遥远的中国，这一阵子，“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是被引用得最多的时代！改革开放25年，就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25年，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经济扭曲和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也在不断暴露。究竟如何看待成就与问题，好与坏？眼下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继续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海内外学者的分析与探讨，只不过这些文章不像文学家那么激情罢了。

开篇郭树清的文章分析了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独特的非均衡现象：在宏观上，它表现为需求波动剧烈、就业形势恶化、收入分配失衡、资本相对过剩；在经济结构上，它表现为产出构成、就业构成、支出结构、资本结构、城乡结构以及地区结构都偏离常态。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偏离均衡状态，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从国际来看，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制造业被迅速纳入世界产业链之中，中国经济以一种特殊的‘加工厂’或‘生产车间’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及加工业比重畸高，沿海地区经济与内地联系相对减弱，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趋高，等等，都与此不无直接关系。从国内来看，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非均衡发展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各方面人才、经验和知识的缺乏。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他还特别强调了“对于现在和今后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八个认识问题：工农业与服务业哪个更重要；城市化会不会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分散的县域工业要不要集中；资本、技术与劳动力是不是只有替代关系；人口多是否必然导致就业困难；农民进城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出口是否比进口更重要；贸易顺差是否一定优于逆差。在探究了原因和认识问题的基础上，郭树清

提出让中国经济回归均衡发展战略基点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德怀特·珀金斯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是根据他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CCWE）的演讲整理而成的。珀金斯教授指出，从资本投资和劳动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是乐观的，但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珀金斯认为，“要想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应该放弃日韩式的产业政策，而选择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哪怕转变的过程将是件艰苦而费时的事情。这种观点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并不是因为我对英美模式的赞美，而是由于我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的观察。”他同时也指出，市场化的方式需要制度规则的支持，包括相应的法律制度，独立、强大而有效的司法体系，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作者最后总结说，“中国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正在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需要的就是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珀金斯教授也是经济历史学方面的权威。他对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农业经济发展有过系统的研究，著有《1368~1968年的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于今年8月由海外回国的李稻葵教授主持成立，从本辑《比较》开始，我们将与该中心合作，开设CCWE专栏，向读者介绍由CCWE提供的演讲和文献。

斯坦福大学的麦克米兰教授一直关注转轨经济，而且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著。本辑《比较》选译的《避免自负及给改革者的其他教训》一文可以说是他对近20年来各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总结。作者分析了贸易开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等改革措施带来的收益，这些收益并不如人们设想的那么大。在作者看来，改革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首先，一系列改革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支援的，这意味着除非其中一个已经到位，否则另一个也不会有效果。如果它的配套改革被遗漏了，一个本来有积极效果的改革甚至会是有害的。其次，我们无法预测市场体制的每个部分是如何相互配合的，更无法预测改革的效果，我们也许知道应该走向何处，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因此，对改革者来说，最主要的教训是：避免自负。

“前沿”栏目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所有者掠夺：以破产牟利的经济黑幕活动》，文章写于十多年前的1993年。不过，面对今年中国特别动荡不安的股票市场和争论不休的房地产泡沫来说，倒仿佛是针对我们所高度关注的那些个争议而做的专论：政府应不应该出面救助陷

入困境的证券公司，究竟有没有房地产泡沫以及该如何来降低风险？作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并以智利金融危机、美国储贷危机、达拉斯的房地产泡沫和储贷危机，以及美国垃圾债券市场为例，论证了在资产有人担保（通常是由政府担保或者最终由纳税人承担损失）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如何掠夺他人的资金，例如金融机构中的存款，用于谋取个人私利。作者的论证表明，“如果企业有动力不惜牺牲社会以破产来牟利而不是全力以赴获取成功，那么经济黑幕活动就会冒头。如果糟糕的会计制度、松懈的监管以及对违规行为惩罚不力，致使所有者为自己获取多于公司价值的收益，继而拖欠债务，破产牟利的行为就会发生。当政府为企业的偿债义务提供担保时，破产牟利时常发生。”更值得引起警戒的是，“掠夺可以共生地蔓延至其他市场，致使充斥着不当激励的地下经济活动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有政府担保的部门的掠夺者将与该部门之外的非关联企业进行交易，让这些企业的生产有助于最大化掠夺者当前攫取的收益，而不关注企业自身的未来损失。掠夺者不是寻找诚实地履行合同的商业伙伴，而是寻找如果履行合同似乎会获得高现值但实际上不会而且也不能履行合同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地矛盾越来越激烈，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所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改革方向和目标，这可能就是一个相当关键和重要的契机。这辑“改革论坛”我们就提供了相关的讯息，《比较》编辑室在部分编委的指导下，参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召开的研讨会，并收集了大量有关土地管理和财产税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篇综述性文章《以财产税为杠杆撬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阐明以财产税改革改善现有土地批租制度的好处。同时，我们还组织翻译了土地管理和财税问题专家理查德·伯德和埃尼德·斯莱克的《世界各国的土地和财产税综述》一文，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财产税的概念和作用，具体介绍了25个国家的财产税征税对象、财产价值如何评估、税率如何确定，以及征税中的特殊情况应如何处理等更具操作性的问题。

“法和经济学”栏目中的《论破产程序之改进》一文是奥利弗·哈特等为1994年8月23~25日“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提交的发言稿，这一被称为“京伦会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不良债务的解决方案、破产程序以及政府承诺的可信性问题。这一

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研讨会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和高度的重视,1999年6月,在《比较》的编委的倡议下,出版了以会议文件为内容的《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一书。近来,有关破产法的讨论正在展开,我们特将这篇“旧文”新登,以飨读者。文章讨论了破产程序的理论和目标,分析了美国破产程序,主要是美国破产法第7章和第11章的缺陷,指出一个好的破产程序应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一是达到事后有效率的结果,二是对在职经理人员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从而鼓励他们在破产前有恰当的行为。一个好的破产程序还应该在资本市场完全或不完全时都能良好运转。在这两个“应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破产程序,该程序的关键所在,是把一个拥有不同权利(因此具有不同目标)的群体转换成一个成份相似的股东群体,然后对公司的未来进行简单投票。作者认为,他们的程序一方面可以很好地平衡破产程序的两个目标,另一方面在完全和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中都能良好运转。

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不过,如何在体制上搞好环境保护,特别是怎样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解决环境问题,我们知之不多。本辑的“比较之窗”栏目为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环境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文章,借鉴他国的经验为了我们自己。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西北部大平原地区的沙尘暴肆虐程度比我国这些年来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沙尘暴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得到治理的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泽伊内普·汉森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加里·利伯卡普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小农场、外部效应和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一文为我们开启了政策制订与执行之窗。文章运用经济学的视角,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相当详细地阐明,沙尘暴灾难所揭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水塘”问题。大平原地区存在着众多的小农场,这严重加剧了水土流失,直到规模更大的治理单位建立起来,统一了个体当事人的意志,问题才得到圆满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风力侵蚀的问题时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与防止过度竞争性的石油开采、渔业捕捞和地下水利用都是相似的。

在本辑《比较》中,我们开设了一个新栏目“经济学教育”,选取了钱颖一的《大学学科布局思考》和王则柯的《考试的局限与升华》两篇文章。两位作者各自的文章都以平实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人深思。钱颖一的文章更是从学科布局这一更广的视野,通过考察美国大学的学科设置,对我国大学的学科布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五辑

- 1 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 郭树清

CCWE 专栏 CCWE Column

- 23 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 德怀特·珀金斯

转轨经济 Transition Economy

- 31 避免自负及给改革者的其他教训 约翰·麦克米兰
Avoid Hubris and Other Lessons for Reformers by John McMillan

前沿 Guide

- 41 所有者掠夺：以破产牟利的经济黑幕活动 乔治·阿克洛夫 保罗·罗默
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by George A. Akerlof and Paul M. Romer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79 以财产税为杠杆撬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比较》编辑室

- 115 世界各国的土地和财产税综述

理查德·伯德 伊尼德·斯莱克

Land and Property Taxation Around the World: A Review

by Richard M. Bird and Enid Slack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63 论破产程序之改进 菲利普·阿吉翁 奥利弗·哈特 约翰·穆尔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81 小农场、外部效应和30年代美国的沙尘暴

泽伊内普·汉森 加里·利伯卡普

Small Farms, Externalities, and the Dust Bowl of the 1930s

by Zeynep K. Hansen and Gary D Libecap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s

- 199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头人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

——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

黄海洲

经济学教育

Economic Education

- 211 大学学科布局思考

钱颖一

- 227 考试的局限与升华

王则柯

中国经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特殊问题

郭树清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北美、欧洲和日本总和的国家,中国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历史奇迹。任何经济体系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都会发生不均衡问题。没有不均衡就没有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均衡应当能够自动得到调整,中长期会趋向均衡。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非均衡形态。不仅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影响范围极广,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的潜力。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一、特殊的非均衡表现

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堪称复杂之最。一方面,有各国工业化、现代化都会遇到的困难,例如能源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还有转轨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问题,例如企业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不良资产率高、金融体系薄弱,等等。更突出的是一些非常独特的矛盾和问题,从一般经济学的角度来归纳,有以下四个方面:

(1) 需求波动剧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出现疲软,投资需求大起大落。存货增加过多。工业产销率经常低于96%的水平

* 本文是作者2004年4月29日参加中共中央党校进修一班A(第35期)时提交的论文。——编者注

(2003年投资很热,也只有98%)。平均每年新增的库存高达2 000多亿元。对外贸易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违反了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此外,出口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进口价格水平持续上升,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2) 就业形势恶化。从90年代初开始,我国非农就业岗位的增长就逐步放慢步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更是与日俱增。从1996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50%左右。这意味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总体,连续多年没有额外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而从1978年到1995年,非农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3) 收入分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然而,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经济起飞的前期呈现缩小趋势,后期却转变为扩大的趋势。这与发展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U型理论正好相反。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最近一些年来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条件与城市居民进一步拉大距离,这意味着他们的平均收入相对下降。城市特殊困难人群的规模也出现增加的势头。

(4) 资本相对过剩。早在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现象,1993年投资膨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之后十多年时间里,如果把外汇储备的因素考虑进来,总体上呈现出资本净流出趋势,平均每年200亿美元左右。一个低收入或低中收入国家却长期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弥补其储蓄不足。

按照世界上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不应当出现上述问题,至少不应当同时出现上述问题。上述诸点大体上也反映了现阶段经济生活的热点和难点,例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国内外不平衡问题,等等。它们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愈演愈烈。在当前经济超常增长的形势下有所变化,但是,多种迹象表明,这种改变并不具有根本意义。换言之,这些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二、远离常态的经济结构

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 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2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 390美元。这两个数字都属于低中收入国家范围。如果观察一些综合性发展指标,例如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等,中国都属于上中等收入

国家水平。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比较,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差异。

(1) 产出构成。在全部GDP中,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比52比33;低收入国家是23比32比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比38比52,世界平均是5比31比64。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上不完全可比,服务业产值的低估可能较为严重,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显然过高。

(2) 就业构成。据统计,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49.1比21.6比29.3。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第二产业的2~3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略高一些,但是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就业统计中没有考虑农民广泛存在的兼业问题,如果按实际工时的分配来测算,那么农民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可能平均只有两个月左右。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估计我们的三次产业实际就业分布大约为25比35比40。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过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3) 支出结构。近些年来,中国GDP的最终使用中,家庭消费支出占47%,政府消费占12%,资本形成将近40%。世界平均为61比17比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0比11比20;中等收入国家为59比15比25。这说明,一方面,中国的资本投入水平是极高的,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总体效益是较低的。此外,中国的净出口占GDP支出的2%,这表明国内储蓄对外转移。

(4) 资本结构。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中国的存货比重畸高,90年代经常持续在资本形成中约占10%左右,约相当于GDP的3%,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有数千亿元的产品生产出来,计入GDP,但是没有卖出去,形成库存积压。十多年来,累计的存货增加高达2万亿元以上,除极少部分为扩大生产所必需之外,主要是产不适销的缘故,由此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在一半以上。

(5) 城乡结构。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0.5%。世界平均水平已将近50%。城市的定义在世界各国都不尽相同。按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口径,人口在2 500人以上且就业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居民区,就被归为城镇而非农村。如果仅就人口聚集程度和非农就业比重两项指标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估计早已超过50%,因为,现在有数以万计的农村和集镇已经实现了非农产业为主,且聚集人口超过2 500人的规模。但是,其他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及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差别较大。

(6) 地区结构。尽管最近两年,某些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省市,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去年以来投资迅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目前沿海12省市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1.3%,在GDP中所占比例为68.7%。一个国家高速增长25年后仍然没有出现地区之间趋向平衡的调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世界常态源于增长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国外,但都有所继承和学习的新增长方式。由于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政策,政府和市场共同导向,农村和城市一起推动,数量和质量目标并列,工业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倡导的一些发展方针的影子,例如,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农村办工业,等等。这种增长方式的优点和成毋庸置疑,但也带来了一部分消极后果。上述对经济结构的简略描述和分析,可以从基础上说明这些事实。

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病在90年代中期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矛盾开始尖锐化。促成这种形势突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内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性的制造业产品趋于饱和,竞争激化,不仅是国有工业企业,而且包括乡镇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二是遍地开花的工业化方式,造成了生态和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经济增长成本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三是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增加,不仅主导了对外贸易,而且开始引领国内产业和市场;四是银行不良资产负担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额贷款增加支持高速增长扩张难以为继;五是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的方式上,与现代化的工业和市场难以契合,极易出现波动和反复。

在研究和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了转变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所谓“两个转变”方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发展战略调整的紧迫性。自那时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但是,就增长方式转变而言,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进展。

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面过剩的状态。商品销售困难,劳动力富余,资金闲置,而且由于粮食库存过多,土地一时也成为稀缺要素。这一切发生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上述问题被正确地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其实也同样可以归结为生产结构不合理,也即有效供给不足。工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高附加值产业缺乏。除了有相当大比例的技术设备需要进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在开拓市场、引导需求、创造新产品方面能力十分薄弱。在大量产品滞销积压的同时,有许多居民和社会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服务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仔细分析,几乎全部服务产业都是供给不足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业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相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业对居民个人的服务,总体上与发达国家50年前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法律、会计和审计,更是严重滞后。毫无疑问,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均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很少看到这种现象。

三、内在的体制和政策原因

为什么资源不能从过剩部门流入到短缺部门?为什么制造业不能从高成本地区转移到低成本地区?为什么粗加工工业不能从沿海发达城市退出来?为什么沿海地区外来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没有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偏离均衡状态,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从国际来看,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制造业被迅速纳入世界产业链之中,中国经济以一种特殊的“加工厂”或“生产车间”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及加工业比重畸高,沿海地区经济与内地联系相对减弱,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趋高,等等,都与此不无直接关系。从国内来看,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非均衡发展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各方面人才、经验和知识的缺乏。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体制和政策方面的。

(1) 政府主导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以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没有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过去25年不可能达到年均9.4%的增长速度。但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还是在高度分权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有五级或六级的政府经济主体在同时活动。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

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2) 要素市场滞后。对于转轨经济国家,市场体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都远不如预期,许多方面停留在“双轨制”上。与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从遥遥领先转变为远远落后。要素市场的开放,无疑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必须慎重考虑。但是,问题在于,因之而不开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更要大得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就是如此。过度担心资本市场出乱子,那么就会不断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要素市场没有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很难实现,行政低效率与官员腐败也与此不无关系。

(3) 激励机制扭曲。在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向上级负责的“官本位”导向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体制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非公有经济部门。地区发展的衡量和考核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主要使用产值指标和财政收入指标。现行财税体制继承了传统的间接税为主、生产环节征收为主的模式,客观上强化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的氛围。新的分税制为主体的财政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但是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能力提高十分缓慢,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企业的激励机制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对于产值、价格、销售额、增长率等指标较为重视,而对于产品创新、品牌意识及市场开拓能力兴趣不足。

(4) 城乡二元制度。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所谓“二元结构”,是指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中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经济存在差别,更特别的是,城乡社会结构、城乡居民的权利义务被二元化了,而且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固定下来。例如,我们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国民义务教育”。过去的改革开放已经猛烈地冲击了这种二元制度,但是其基本的框架依然保留至今。这个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扭曲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5) 涉外经济优先。对外开放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体制改革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东部省市由于交通、通信、技术、人才的有利条件,获得了对外经贸发展的良好机遇,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除了公开的优惠之外,金融、外汇、外贸、外资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巨大的隐性好处。涉外经济部门渐渐与国内经济部门相对分离,在相当大程

度上形成了自我循环或与国外经济联系更紧密的格局。目前,中国沿海与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处于相同的产业链条之中。外贸进出口中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进出口绝大部分都只限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关联很少。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形态的“二元结构”。

(6) 服务业过度管制。在任何国家,一些服务业因其功能特殊,都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调节。例如通信业、金融业、保险业、媒体和广告业、卫生保健业,等等。以防范风险为目的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调控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服务业的管理,长期保留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制度和办法,与新的形势严重不协调。一方面,该由政府部门负责管理的资质审查、合规性监督等等很不落实;另一方面,该由企业或事业法人自己独立经营自主负责的事情又常常听命于政府部门。这在市场中介机构、教育、文化单位尤为突出。这导致服务业发展困难重重,活力不足,无论是经济效果还是社会效果都很不理想。

四、需要澄清的认识问题

我国经济特殊的非均衡状态的形成,主要源于客观的国内和国际原因。特别是当我们把历史惯性理解为无法随意改变的因素时,更应当这样看待现实。但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无法忽视。这对于现在和今后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谓主观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牢固确立客观全面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经济发展和政策措施常常带来正负双重影响,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时刻想到事情的两个方面。然而,我们过去的教训在于常常过分地强调某个方面而忽略或否定另一方面。这自然会片面地反映事物的矛盾性质。并且,还存在着一些并非是问题的问题,或者曾经是问题的问题。这很容易误导我们的方针和政策。这里择其要者略作分析。

(1) 工农业与服务业哪个更重要?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产品和服务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二次产业与三次产业的关系。传统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物质第一,物质生产是基础。但是这里的物质和物质生产是不包括服务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部门,竭力予以限制和压缩。后来提出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将其放在补充的、附属的、次要

的、第三位的经济活动来对待。这是导致服务业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明确阐述过,生产活动包括服务类活动,而且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从经济内部的联系来看,物质性产品无疑具有基础意义,但是服务本身有一部分就是物质性生产的必备条件,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提供给消费,满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因此,服务业是农业和工业的依托,是国民经济的纵深。更重要的是,服务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中枢、核心。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和生机的部门都集中于服务业之中。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衡量尺度。愈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经济,服务业的份额愈大;而且愈是服务业发达的国家,常常愈是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产品与服务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是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是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关系,是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硬实力,主要由钢铁、机械、粮食等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来体现;一类是软实力,主要由金融、文化、教育、科技等服务业水平来体现。如果继续把第三产业仅仅理解为饭馆、旅店、擦皮鞋、修电器,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

(2) 城市化会影响农业发展吗?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城市疯狂扩张,造成惨痛后果,留下来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中南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形成贫民窟灰色地带,也常常让人思之恐惧。毫无疑问,没有工农业的持续发展,城市化的持续提高就没有基础;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没有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工农业也无法持续提高。在工业化高速推进时期,城市化进程不仅可能而且应当与之相适应。人们最担心的是城市发展会占用更多土地,从而会影响农业。就居民占用的住宅等生活用地来比较,城市化会带来土地节约而不是浪费。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用地133平方米,而农村居民是182平方米。高度分散的村落还由于道路、供水、供电设施等等而占用更多农田。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外,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规划不落实,执行规划不严格或任意修改规划,因此严格保护耕地的规范尺度成了松紧带,乱占滥用土地成为风气。

城市人口集聚程度取决于农业的供给能力。农业科技水平很低时,对劳动投入依赖极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不再依赖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或多或少已经成为农业进一步